

外来启迪与本土发生： 译介学理论的中国语境及其意义*

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提 要: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译介学理论的发生, 进而观察其与时代文化和学术语境的关系, 是理解其核心内涵和阐释潜力的一个重要维度。译介学理论之所以在 20 世纪末的汉语学术中生成并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既是中外理论汇通激发的结果, 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大量译入实践的意义被重新凸显的结果, 也是多学科理论不断更新、视野不断拓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 译介学既是个理论事件, 也是中国翻译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这两个不同层面观察译介学的发生可以进一步体现它的特点和针对性, 显示其在汉语学术中的多学科意义。

关键词: 译介学理论; 发生语境; 多学科意义;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9)04-0103-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9.04.018

Foreign Inspiration and Local Happening: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Significance of Medio-translatology

Song Bing-hu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ain content and interpretative potential of Mediotranslat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trace its happe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to study 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academia. Mediotranslatology came into being and received heated and wide discussion in Chinese academia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theories, the import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since modern times, and continuous renewal of multidisciplinary theory and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disciplinary horizons. Mediotranslatology, in this sense, is both an individual theoretical event and a crucial link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bservation of Mediotranslatology from both aspects will help to reveal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pertinency, and its multi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academia.

Key words: Mediotranslatology; occurrence context; multi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academic history

某种理论或学说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力的大小,除了这种理论或学说所关涉问题的重要性、理论的创新程度以及所表述的理论内部的逻辑合理性等因素外,还取决于它在研究实践中阐释效应的高低及所涉及领域的广泛程度。反过来,理论的阐释效能及影响范围又与这一理论与其所产生的学术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程度密切相关。因

此,从学术史角度观察某种理论学说的具体发生,进而观察这种理论与时代文化、学术语境的关系,是理解这一理论的核心内涵、评估其阐释潜力的一个重要维度。

作为上世纪末至今近 20 年间中国人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理论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交叉孕

* 本文系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学术史研究”(KY01B0322016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 swsongbinghui@126.com

育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是当代中外学术交流汇通的结晶。它在相关学科所持续引发的关注、讨论和影响力,在当今这个所谓的“后理论”时代,并不多见。今天,汉语学术话语中的“译介学”总与它的创导与建构者谢天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谢天振是这个理论的倡导者,也是这个理论基本体系的完成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译介学理论看作个体的理论创建和成就。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译介学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末的汉语学术中产生并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是中外理论在这一特定时空中汇通激发的结果;特别是汉语文化系统中自近代以来生成的大量翻译文化实践的意义,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代被重新透视、重新凸显的结果;也是与此相关的不同学科理论不断更新、视野不断拓展的结果,所以译介学的生成不单单是个体事件。面对同一个分析对象,从不同的参照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意义上的译介学,一是作为个体理论创新意义上的译介学,另一种是作为当代学术思潮发生、演变意义上的译介学。虽说这两种译介学的所指可以是同一个对象,却可以显示不同的意义层面。如果从两个不同的层面观察译介学的发生,或许可以进一步显现译介学的特点和针对性,进一步显现其在汉语学术中的多学科意义。

如果从学科理论演变的逻辑关系角度看,译介学分别是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各自变革,继而相互启发、交叉影响,终于合流的结果。在传统的比较文学理论中,译介学属于影响研究的一个分支,即媒介学(Mesologie)的一个关注对象。作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媒介学以探讨民族文学间的影响为宗旨,对文学跨文化影响的途径、方法、手段及其因果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而翻译是促成不同民族文学间发生影响的最主要的媒介方式,属于文字媒介。但在传统影响研究视域中,文学翻译虽然是这种跨文化、跨语言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基本上这个途径被视为影响达成的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本身则被看作透明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对作为跨文化实践的文学翻译的理解还处于工具性认知层面上,它与传统翻译理论共享同一种等值转换意义上的翻译观念。而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则是译介学理论来自翻译研究学科的另一重要思想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J. Holmes)、伊文·佐哈尔(I. Even-Zohar)、吉迪恩·图里(G. Toury)、勒菲

弗尔(A. 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S. Bassnett)等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综合各种翻译理论及不断发展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他们的理论表述各不相同,但都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一个动态的体系;都属于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研究,都将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实践的结果、翻译的功能和体系上;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及其接受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与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

这种国际学术思潮的流转无疑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跨文化学术现象。当然,这种学术理论的跨文化旅行及其再生总有文化的“时”与“空”两个方面的差异,其具体发生的语境与场域也并非均质地展开。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这一本质上属于多学科交叉领域的学术思潮的反应,一方面在时间上相对滞后——差不多有十年左右的时差;另一方面在程度上又是深刻的,富于创造性的。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全面开放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当代西方思想与学术的了解也有一定的滞后,但中国翻译理论界,包括谢天振在内的少数敏感的学者,对这一西方学术思潮的变化予以足够的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到今天,中国的人文学术深深卷入这一国际化学术思潮中,并因为这一思潮在翻译研究、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国别文学等相关学科都相继引发重要的推动作用,译介学理论也在汉语学术界产生持续、深入的影响。谢天振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在汉语学术界创立译介学理论,先后出版《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1993)、《译介学》(1999/2013)、《翻译研究新视野》(2003/2014)、《译介学导论》(2007/2018)、《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2014)等一系列著作,系统论述翻译文化研究的新观念、译介学理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翻译文学史如何建构等理论问题,基本完成中国译介学理论的建构,由此引发学界近二十年的持续关注 and 讨论,这种关注和讨论不仅使比较文学学科中的翻译研究成为一个持续的热点领域,还在翻译学、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也产生广泛的影响。我们仅从十余年来国内人文学界有关翻译问题的学术会议就可以看出,发起与主办翻译问题学术会议的学科与机构已经从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扩大到中国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乃至相关学科的联合举办。

总之,无论从学术成果、理论建树还是学术影响而言,译介学已经成为汉语学术中对应于国际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y)具备自身关键学术话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这当然与40年来中国社会全面开放、中华文化学术日渐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趋势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与文学交往这一现代传统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文学术中的必然体现。

对译介学理论在汉语学术中的出现,外来学术思潮的启发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更有其中国本土文化的发生条件。这种发生条件既包括社会共同体意义上的特定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也包括理论创建者个体所感受的具体学术思想的激发与启示。

就前者而言,近代以来贯穿整个20世纪的汉语翻译实践是中国文化历史无法忽略的事实。如果说跨文化译介实践及其成果(即翻译文本)是人类文化史,确切地说是人类文化关系史上广泛存在的现象,只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就有翻译实践的具体展开。那么,中国近代以来翻译作品数量如此之多,翻译在本土文学与文化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并且这两者在整体上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当然期间也有峰谷的起伏),则绝不是在任何文化之间、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发生的,它与中国文化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自19世纪末开始发生的现代转型有关。从更大范围来看,也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东西方世界的最直接、全面的接触和文化大碰撞有关。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具体表现包括:大量的汉语翻译文学、文化作品的出现;几乎大部分重要的作家、思想家都参与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译介实践,他们中的许多代表性人物都有翻译与写作两副笔墨和双重身份,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人甚至是以翻译活动开始其文学生涯,其译介文字的数量甚至超过创作文字的数量;本土创作与外来文学思潮、流派、风格之间有形态各异但程度明显的关联性,等等。这些自近代以来的文化与文学传统早就引起新文化与新文学人士的关注,并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就反映在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在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以及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1939)中,都设专章讲述汉语翻译文学,阐释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意义。但这种学术传统在40至70年代的40年间未能得以延续,至

80年代初开始,这一传统再度引起研究者——首先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其代表人物就是施蛰存(1905-2003)与贾植芳(1915-2008)。

施蛰存和贾植芳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又都是翻译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家,而且分别在上海两所具有深厚人文学术传统的大学任教。在80年代中后期,他们几乎同时强调近代以来的汉语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

施蛰存的工作是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翻译卷(第26至28三卷,上海书店1990-1991年出版),这本身就说明他对翻译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史实的熟悉,以及对其意义的重视。这套近代文学大系共计30卷,是对近代30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展示。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序》中,他把近代30年(1890-1919)确定为中国翻译文学史(指汉译——笔者注)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施蛰存1990:4),分析近代翻译文学被五四文学兴起后的新文学人士所忽视的原因,进而肯定赵景深、郑振铎(特别是钱杏邨(阿英)在这方面的整理、发掘和研究工作。尽管施蛰存对于翻译文学是否真正属于中国近代文学持谨慎态度,但他在序言后的“附记”中指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收入《翻译文学集》这一设计,为以前所出《新文学大系》二编所未有。最初有人怀疑,翻译作品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吗?当然不是。但我们考虑的是:外国文学的输入与我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记录,也许更容易透视近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并强调“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同上:27)。三卷本翻译集编撰本身已经表明他将汉语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视野的倾向和意图,他估计这时期翻译出版的小说多达400-480部,是两倍于创作小说的总量。他尤其概括了经由翻译而对中国文学的3点具体影响,即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和对小说社会功能重要性的认识;改变了汉语文学语言;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引进了戏剧等新文体。

贾植芳的工作是主持编辑《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993),在这部历时多年编撰而成的大型书目中,专门列有翻译文学书目,这也是他一贯所持的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贾植芳、俞元桂1993:2)观点的体现。他在为谢天振的学术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作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尤其赞赏天振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分析。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鲁迅起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无不从翻译文学中吸取到珍贵的养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翻译文学,也就没有由‘五四’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文学理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上),该段正是这种启发与认同的证明。

施蛰存与贾植芳这两位文坛与学界的前辈恰恰都与谢天振有特殊的关系。两位学人都是《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最早的编委,施蛰存还是首任副主编,贾植芳后由编委改任主编一职,而谢天振则从杂志筹备期开始的编辑部主任到后来接替贾植芳担任主编,是从创办开始一直为本国内唯一比较文学专业期刊付出最多的人。在《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和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中,这两位学人对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经验和评价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学术思想资源。

相对于与上述两位前辈学人的关系,谢天振的译介学理论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重写文学史’”的事件直接发生契机,准确地说,最初译介学理论的建构是作为传统学科分类中被归于“国别文学研究”的“重写文学史”事件的组成部分。1988年,《上海文论》(双月刊)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专栏,专栏的发起和主持者意在通过这一栏目突破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视野和研究框范,邀请国内相关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提出某些质疑性的探询和多元化的阐释,涉及的作家有柳青、赵树理、郭小川、何其芳、丁玲、茅盾等,涉及的文学现象有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宗派问题、现代派文学问题、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理论的再评价等,谢天振所撰写的《为“弃儿”寻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一文刊登在该刊1989年第6期(11月)上。该文正是作者就汉语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主体的创造性界定、汉语翻译与民族文学史书写等问题发表一系列观点的开始,也是他基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西方翻译理论的新资源和近现代汉语翻译文学的传统资源,积极建构译介学理论的开始。在之前的汉学学术中,虽然也有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1984)一书,在介绍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理论时,使用过“译介学”概念,这大概是汉学学术中最早使用“译介学”概念的著作,但限于该书的体例,作者并未就此展开论述,尤其没有将这个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与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实联系起来。后人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

假设:即使谢天振的这篇文章不在《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上发表,对于作者而言,这样的观点与思路事实上已经形成,它们迟早也会在另外的学术媒介中公诸于世,但历史的展开往往又离不开特定的偶然性契机。发起并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的陈思和与王晓明分别是任教于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恰恰又是当时与谢天振已有近二十年交往的朋友,《为“弃儿”寻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一文的撰写动因和在该“专栏”的发表本身就体现出朋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沟通各自研究领域心得的契机。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前述与施蛰存、贾植芳两位学界前辈的交往一样,都是译介学理论发生的个人性具体历史语境。从近距离看,这种个体之间的交往难免带有历史和个人的偶然性,但如果放大焦距,这种偶然性又是以中西学术思潮的交流、以本土现代传统的反思等宏观的学术文化变迁为背景,又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对译介学理论的理解与分析,笔者在之前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已经表述过我个人的理解,这些文章大多收录在笔者的《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以作家翻译为中心》(2013)一书中。在这里之所以不直接对译介学理论的内涵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而是描述一些我所了解的学术史实,除不想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之外,还想尝试对谢天振译介学理论做一种历史发生场景的还原。

思想史不单单是思想的历史;理论史不仅仅是理论演变的过程;同样,理论也不仅仅是一系列概念、命题及逻辑体系本身,在概念、命题与逻辑体系的背后,一定有它的文化发生动因。通过对某种思想或理论的发生语境和文化动因的分析,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这种理论的内涵及其特点,也有可能更好地运用理论、丰富理论、补充和调整理论。为此,我在这篇短文中,尝试通过对译介学理论的具体发生语境及其过程的描述,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它的鲜明特点和理论前提,那就是译介学不同于以往的翻译理论之处在于将翻译实践及其成果视同跨文化行为。它的理论针对性和阐释的有效性突出地体现为:对翻译实践的历史文化效应的描述性研究;对文本之外的译者主体及其文化身份与立场的关注;对翻译策略与其所处文化语境之间关联性的关注;以及对翻译的文学性文本与非文学性文本(科技、信息类)之区分的关注,等等。通过译介学的发生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国别文学与文学史理论等多学科

资源的系统分析,进而理解译介学理论相应地在上述这些学科乃至其他相关学科中的影响。既然是经由相邻、相关学科在40年来自我反思与更新进程中的互动启发而产生,那么它的应运而生所引发这些相邻、相关学科的关注和讨论,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影响也就在意料之内,情理之中了。

通过这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理解和发掘汉语学术中的译介学理论所体现或者潜在的国际性意义:这种本土文化翻译理论是感应于比较文学理论,尤其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等国际学术思潮,同时又坚持以中国本土的翻译实践及其成果的文化效应为理论基础,由此建构既有中国问题意识又与国际翻译理论形成有效对话,并给后者以丰富滋养与补充的理论,这也正是译介学理论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完善、丰富和调整的潜力与方向所在。同时在中国学术史演进中,它还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自身的学科话语提供一个正向的案例。

参考文献

- 陈子展.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 上海:太平洋书店, 1930. || Chen, Z. -Z.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Recent 30 Years* [M]. Shanghai: Pacific Bookstore, 1930.
- 郭箴一. 中国小说史[M]. 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 || Guo, J. -Y.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s* [M]. Changsha: Commercial Press, 1939.
- 贾植芳. 序[A].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C]. 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 1993. || Jia, Z. -F. Preface [A]. In: Xie, T. -Z.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Taipei: Taiwan Yeqiang Press, 1993.
- 贾植芳 俞元桂.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 || Jia, Z. -F., Yu, Y. -G. *General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3.
- 施蛰存.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1840 - 1919(翻译文学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 Shi, Z. -C. *Depart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840 - 1919 (Translated Literature Collec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0.
- 宋炳辉. 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以作家翻译为中心[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Song, B. -H.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Focusing on Writer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王哲甫.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 北京:北平杰成书店, 1933. || Wang, Z. -F.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M]. Beijing: Beiping Jiecheng Bookstore, 1933.
- 谢天振.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 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 1993. || Xie, T. -Z.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M]. Taipei: Taiwan Yeq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3.
-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 Xie, T. -Z. *Translatolog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3/2014. || Xie, T. -Z. *A New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Qingdao: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2003/2014.
- 谢天振.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Xie, T. -Z.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谢天振. 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Xie, T. -Z. *Transcending Text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018. || Xie, T. -Z.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and Mediation*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2018.
- 朱自清.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A]. 文艺论丛(第14辑)[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Zhu, Z. -Q. *Outline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Research* [A].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ies Series (Vol. 14)* [C].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2.

定稿日期:2019-06-10

【责任编辑 王松鹤】